

# 「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文化基因

• 王 毅

「中央文革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文革」)的產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無疑是文革政治體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其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中央文革」是毛澤東發動、進行文革的最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核心(按照當時通行的說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參謀部和戰鬥指揮部」)，而且更在於「中央文革」的成員構成、生成方式和運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誕、不易理解的：寥寥幾個舞文弄墨的秘書文士(其中多數人的資歷名望原來極淺)，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成了口懸天憲、執掌全國各級官員和億萬民眾生死的權力巨頭；這個極小的秘書班子取代了縝密有序的國家常規領導階層，進而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和各種殊死政治鬥爭的策源地，並且在瘋狂打擊各種政敵的同時，又在一輪接一輪永不止息的權力角逐中，難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毀滅的深淵。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執行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sup>①</sup>；那麼，文革中為甚麼一定要發明這種「新生力量」以「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中央文革」上述諸多文化特質又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與中國政治制度史演進的長鏈又有怎樣的關係？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構成、生成方式和運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誕、不易理解的。那麼，文革中為甚麼一定要發明這種「新生力量」以「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 「中央文革」產生和權力急遽膨脹的過程

「中央文革」的產生方式和權力急遽膨脹的過程，是億萬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所十分熟悉的，這裏僅作簡要的回顧：1964年5、6月間，在「批判資產階級」和「掃除一切害人蟲」的戰略日益成熟和趨於白熱化之際，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隸屬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組就批判吳晗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7日寫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擬向中央匯報。先此，

彭真和康生已於5日將《提綱》的內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匯報，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康等趕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當面並未表示異議（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追述：「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說明」）。12日，彭、康等到上海，將《提綱》給江青、張春橋看了，他們均表示同意。23日，《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不久以後，《提綱》即被毛澤東指斥為「修正主義綱領」。

與上述黨內正式渠道的運作相對，毛澤東早在1965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用極隱秘的方式將文章初稿傳送到北京反覆修改。1966年3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澤東匯報的機會對毛談及：彭真曾質問上海發表姚的文章為甚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去了？這話當然觸怒了文章的幕後組織者毛澤東，所以康生說：「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於是毛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釣魚台寫作班子傳達毛發動文革的精神，並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提綱》作廢。《通知》初稿被毛澤東認為過於簡單，他指示陳伯達主持，另寫一批判《提綱》的文件。陳遂與王力共同起草，然後送毛澤東審定。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立，成員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同時，毛澤東又在上海召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會議。在此期間，毛對《五一六通知》反覆修改後下達政治局，政治局擴大會議被迫接受《通知》，並作為「中發(66)267號文件」下達，「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發動。5月28日，「中央文革」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組的基礎上正式成立，名單主要由江青提出：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8月，陶鑄被任命為顧問。在文革初期，1966年5月至12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會決定，「中央文革」成員僅能列席參加。但是在1967年1月，江、陳、康等將陶鑄、王任重打倒，書記處遂停止活動。接着，由於「反擊二月逆流」，作為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七人被迫「靠邊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動，從此，「中央文革」奪取了政治局的大權<sup>②</sup>。以後，中共八屆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公報》(1968年10月31日)對「中央文革」的統治地位予以法定確認：

全會認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個時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講話，都是正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報》緊接着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文革的這一破一立，當然具有聯袂並舉的最顯著聯繫。直到中共九大開會時，「中央文革」成員坐在主席台左邊，政治局委員坐在右邊，主席團名單亦是「中央文革」成員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員排列在後。

彭真曾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甚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去了？這話觸怒了文章的幕後組織者毛澤東，於是毛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導致「中央文革」產生方式及其成員構成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毛澤東感到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辦公廳、中宣部、《人民日報》等常規權力體制在貫徹和強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他的個人意志又經常受到這套權力體制的強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於他對國家體制日益官僚化和「變成法西斯黨」危險的警惕。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多次說北京的空氣不好，說自己不讀《人民日報》；他指責「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sup>③</sup>，暗指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文革前他長時間遠離北京，甚至「重上井岡山」，醞釀「以農村包圍城市」；他不斷對教育和文藝體制予以強烈的抨擊……。因此，與毛澤東「中央要出修正主義」這種對國家政治路線性質的基本判斷相輔相成的，是他對國家常規權力體制的敵視（從早年的喜愛綠林小說到晚年對「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終伴隨着對國家體制的強烈「造反情結」，這對判斷國家制度的性質和發動文革有重大影響。關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周期性「造反」機制與文革的關係，筆者將另文詳述），所以後來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首要目的就在於「炮打司令部」、「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為了摧毀常規權力體制，毛澤東必須在國家制度中造就一個與此目的相適應、得力而強大的政治工具，這個工具要具備的條件是：1、它必須由毛澤東直接和完全駕御、絕對按照毛的個人意志行事，即前引周恩來所說，「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2、它必須具有極強的政治能量和權力欲望，以便與常規體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3、從政治稟賦來說，它必須與一系列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相矛盾、甚至相敵對；與此相應，從政治行為方式來說，它也必須捨棄常規方式而以陰謀詭計等一切非常規方式為基本手段；4、它必須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動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閻王」在輿論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所以我們認為，「中央文革」的一切政治惡行，主要都不是由於其成員的道德羸劣以及他們與無數受害者的個人恩怨所決定的；相反，它是出於政治制度設計和運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澤東通過自己的秘書班子而與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相抗衡並非偶然，早在他熱衷的合作化運動中，由於負責農業的一些領導人被認為是拖運動後腿的「小腳女人」，所以他在〈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中對之提出嚴厲的批評。「而這篇講話是在他無視某些地位極高的同事們的看法以及黨的農村工作部的計劃的情況下發表的。它越過中央官員，直接向省級領導人發出呼籲，……為了保證省級領導人不受中央農村工作部觀念保守官員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將兩名久經考驗的助手安插到該部擔任副部長。這兩個人是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和陳正人。」<sup>④</sup>可見，毛澤東對這種政治操作方式的運用久已嫺熟有效。為了保證這種有效性，毛澤東對秘書班子的基本要求即在於：他們絕對不能被國家和黨的常規權力體制所控制。據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何載追述，他在50年代調入中南海時，在楊尚昆領導下就任於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和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1956年的某日，毛澤東的身體不適，「不久我得到了電話通知，要適當減少給他送閱的東西。我……向有關辦公室轉達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當年的

毛澤東從早年的喜愛綠林小說到晚年對「宋江投降」的批判，始終伴隨着對國家體制的強烈「造反情結」，所以後來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首要目的就在於「炮打司令部」、「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習慣是每天要看三四萬字的東西，現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發覺，在一個會議上提出批評，說一個姓何的封鎖他，還舉了些歷史上封鎖國君的惡劣行徑和嚴重後果的史例。我簡直嚇壞了，認為闖了大禍<sup>⑤</sup>。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睡在身邊的」敵人運用國家常規權力體制以達致「封鎖國君」的目的是有着高度警覺的。同時，聯繫古史，我們也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的操作方式難道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發明嗎？而對此疑問的說明將讓我們看到：文革與中國古代君權專制制度的聯繫，並非只是局限於人們通常直觀看到的表層（例如家長制），相反，在政治運作方式等等層面，兩者的相通實具有更深刻的、更具制度化的意義。

### 從皇權與官僚體制關係的歷史看「中央文革」的政治功能

在中國傳統的君權政體中，皇權與中國行政體系之間的關係，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時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衝突的一面。後一方面的情況即如明太祖朱元璋所總結的：「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sup>⑥</sup>因此，在這種長期的矛盾關係中維繫君權的至高無上，就成了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權力體系發展演化的一條重要線索。而這種演化的基本軌迹在於：如何在必須建立龐大國家常規官制制度並賦予它巨大權力的同時，又能克服它對君權的束縛、保證君主的集權。

在中國傳統的君權政體中，皇權與中國行政體系之間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時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衝突的一面。所以，為了從制度上保證君權獨專，必須不斷在常規官制體系之外，設立被皇帝個人親幸的政治班底，使之在常規體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脹。

秦漢以後龐大統一君權國家的建立，要求相應地建立龐大的官制體系。早如戰國後期的政治家就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sup>⑦</sup>；「群臣守職，百官有常」<sup>⑧</sup>。這是指以宰相為首、序列百官的正規國家官制體系，它的建立、完善和有效運作，是國家政治有序化的基本保證。但另一方面，龐大完整的常規官制體系之建立和有效運作，又必然與君權獨專的趨向發生矛盾。例如，宰相百官可以通過諫諍、對詔書的核議、一層層的政務程序等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來抑制君主個人的獨斷專行。這當然又要引起君權的反抑制。從根本上說，君權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無法無天、濫施淫威等非制度化的手段來實現，因為這不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備長久的權力合法性（韋伯 Max Weber 指出：權力體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綜合運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傳統合法性的結果）。所以，中國傳統政治體系必須發明一些能夠從制度上保證君權獨專得以充分實現的手段。這些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就是：不斷在常規官制體系之外，設立被皇帝個人親幸的政治班底，由它執掌國家最高權力的最高機密，並且通過它對常規官制體系施以強大的抑制；同時，努力賦予皇帝的這個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規體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脹。

上述規律在漢代以後的官制演變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漢代常規官制體系原本主要是由以宰相（三公）為首的外朝百官組成，皇帝身邊的各種人員只負責生活服務而不具備政治權力。但是漢武帝感到這種制度不能適應君權充分控御的朝政的需要，於是為了強化皇權並抑制宰相公卿的權力，他就在常規官制之中

強行楔入「加官」制度<sup>⑨</sup>——即皇帝超越正常的選拔程序和宮禁制度，親自擢拔一些富於才幹的官吏（多數出身較低微）成為「出入禁門」的「腹心之臣」<sup>⑩</sup>，並讓他們越過外朝百官的制約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協助制訂政治方案。漢武帝的另一項意義重大的舉措是：任用原本地位很低、負責掌管宮廷文書的小吏「尚書」，充當自己身邊掌握國家政治機密的謀臣。以後，這種政治設計迅速制度化：在漢代，尚書（與三公相比，他們通常是皇帝的親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僅越來越高，而且極大地侵奪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層首長的權力。東漢時，「尚書台」實際上已是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而原來總攬朝政的宰相則日益被架空，所以史籍記載：「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sup>⑪</sup>；「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即尚書台）」<sup>⑫</sup>。至魏晉時，尚書名正言順地成為正式的國家宰相，而三公則成了沒有任何實際權力的虛銜：「中書、尚書之官始為真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sup>⑬</sup>這一演化過程說明了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專權遠不僅僅是皇帝的強烈個人意志，而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必然固化為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和具體有效的制度。

歷史的發展多次重複着上述規律。例如當尚書在魏晉完全取代三公而成為外朝百官首長時，皇帝已經不允許其身兼內朝和外朝的權力。具體方法是剝奪了原屬尚書郎（尚書的屬官）起草詔書的權力，改由以前僅為宮廷小臣的「中書」負責，而尚書僅負責詔書的執行。由於中書是侍奉皇帝左右、負責宣達聖命的文士，所以其部門首長（中書令）也就很快同尚書令一樣，於名於實都成為政府首腦。而當這一制度確立以後，南北朝時期的皇帝們又啟用出身微寒、富於政治進擊性的文人學士作為自己半秘密和負責起草詔書的政治秘書班底，並給予驚人的巨大權力，以與制度化的龐大官制體系相抗衡而保證皇帝專權的充分實現。這種中國歷朝廷續不斷的政治秘書班子，在南北朝時是「中書舍人」，在唐代是「北門學士」、「翰林學士」，在五代是「樞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時的「南書房」和後來的「軍機處」。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詞之士以為「天子私人」並組建「學士院」，進而任用這些恩幸權臣作為「專掌內命」、控御朝政的工具，這種制度相當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體系「封鎖國君」的可能，但是它並不能杜絕專制體系中的其他「惡劣行徑和嚴重後果」。例如南朝時，皇帝出於戒備宰輔等外朝眾官的目的而讓國家行政大權掌握在侍奉於自己身邊的幾個恩幸文士小臣（中書舍人）手裏，結果是：「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sup>⑭</sup>也就是說，恩幸文士的「鼠憑社貴」極大地激化了權力體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衝突，並導致整個國家迅速淪入災難的深淵。然而，由於離開了這種手段，君權就無法抑制常規國家官僚體制「封鎖國君」的趨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國君」們就只能重演着這幾乎千年未變的悲劇。只要略略翻閱一下歷代史籍中的有關傳記，就可以立即知道本文上節所述「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稟賦和行為方式，其實無一不是歷史上這些恩幸文臣及其政治組織世代沿襲不改的。限於篇幅，僅舉北魏中書舍人溫子升的例子。當時，魏莊帝已經秘密布置好誅殺執掌朝政的大將軍爾朱榮的

中國歷朝廷續不斷的政治秘書班子，相當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體系「封鎖國君」的可能，但是它並不能杜絕專制體系中的其他「惡劣行徑和嚴重後果」。也就是說，恩幸文士的「鼠憑社貴」極大地激化了權力體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衝突，並導致整個國家迅速淪入災難的深淵。

中國君權具體的操作方式和縝密的制度，積澱成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資源和集體無意識，從而長久地影響着後人。因此，透過「破舊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見出「中央文革」在本質上向中國傳統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徑，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體工作之一。

計劃，並由近侍文人溫子升負責起草有關文件。當溫子升拿着誅討爾朱榮的詔書出宮時，迎面遇到爾朱榮入宮。爾朱榮拿過詔書問道：「裏面是甚麼內容？」溫子升應答時神色不變，絲毫未引起爾朱榮的懷疑，所以他並未打開詔書細看，遂毫無戒備地入宮受死<sup>⑩</sup>。古代的這類例子，當然與1965年通過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寫批判文章、並以此發動宣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刑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操作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雅斯貝斯 (Karl Jaspers) 指出：「一旦建立了獨裁制，便不可能從內部把它消除。……這部機器幾乎自動地保持它自己。」<sup>⑪</sup>在中國君權的長期發展中，其「自動保持自己」的趨向演化為一系列具體的操作方式和縝密的制度，所以它才能夠積澱成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資源和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而長久地影響着後人。因此，透過「破舊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見出「中央文革」在本質上向中國傳統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徑，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體工作之一。

### 註釋

- ① 引自南京農學院革命委員會編印：《讀報手冊》(1969)，頁290，「中央文革」條。
- ② 詳見譚宗級：〈「五·一六通知」剖析〉，《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7-11、30-32。
- ③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60。
- ④ 麥克法夸爾著，魏海生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19。
- ⑤ 何載：〈我給毛主席當秘書〉，《作家文摘》(北京)，1996年1月5日。
- ⑥ 〈鬼神有無論〉，《明太祖集》，卷十(合肥：黃山書社，1991)，頁223。
- ⑦ 〈君道〉，《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頁129。
- ⑧ 〈主道〉，《韓非子集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頁67。
- ⑨ 詳見《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 ⑩ 《漢書》，卷六十四上，〈嚴助傳〉。
- ⑪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忠傳〉。
- ⑫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另參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六，「尚書」條。
- ⑬ 《文獻通考》，卷四十九，〈職官·三〉。
- ⑭ 《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
- ⑮ 《魏書》，卷八十五，〈溫子升傳〉。
- ⑯ 卡爾·雅斯貝斯著，魏楚雄等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234-35。

王 毅 1954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北京三聯書店《愛樂》叢刊特約編審。曾發表文史哲及宗教、建築園林和文革研究等方面的多種論述。